

王怀昭、杨淑芬、宫铭彬、陈婉婷、刘可等5人正在讨论中

《燕食记》:怀旧凝视、地方文化志与古典小说传统的新变

王怀昭(主持人):近年来,葛亮的小说,诸如《朱雀》《北鸢》《瓦猫》等备受瞩目。《飞发》更是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今天我们讨论他的最新长篇小说力作《燕食记》。葛亮善于以一簞食一瓢饮的日常生活光景传递镌刻着文化基因的历史乡愁,让平凡人与英雄人物在同一时空中相遇相交、继而碰撞出精神火花。这种在怀旧的近距离凝视中呈现地方志的写作手法,于纪实与虚构之间来回穿梭以亲近生活肌理、触碰文化内质的艺术表达,不仅是《燕食记》的特点,也成为葛亮小说独特的风景。

杨淑芬:以食物抵达怀旧的凝视

葛亮小说中的食物有着极为重要的叙事功能。历史浩浩荡荡、静默无言,但平常生活中的食物却通常以活色生香的样貌出现。小说以食物为主线书写历史时间中小人物个体的精神成长,以器物为辅线探索生命、精神、理想的可能,在过去与当下的交错中,食物与器物的呼应里,一股浓烈且克制的历史乡愁弥漫开来。

饮食生活和厨艺发展与小说人物的自我发现、自我价值实现息息相关。青年时期的荣始生和陈五举都在厨艺精进的过程中发现自我,明确人生价值;在学厨的同时收获代际传承下来的人生道理和价值经验,从而得以建构自我的主体精神。对于小说中的女性厨师如戴凤行而言,饮食和爱情形成某种同构关系,正是在这种爱情和饮食的结盟中,个体得以实现双重价值。

器物,暗含了个体关于生命精神理想的追寻。在荣始生和秀明相敬如宾的婚姻生活里,一直存在着第三个人——司徒云重。司徒云重是荣始生年少时的爱情理想;二人的重逢得益于同饮楼新人的骨碟,正是那朵极具特色的青色流云指引着荣始生追寻到等候多年的司徒云重。与司徒云重的重逢不仅弥补了荣始生的情感缺憾,而且协助荣始生完成童年到中年的自我追问。器物,也承载了个人生命中经历的美好人情、美好记忆。比如荣始生对“那扇乌黑的铁木大门”的情感,其实是对自己与七少爷真挚情谊的追认。陈五举的一把白案刀,不仅是同饮楼大按厨精湛的象征,而且是陈五举和戴凤行情定半生的物证,更是一刀天人两隔的命运节点。一把白案刀带来的幸福与悲苦,最终都转化成陈五举对人生和命运的重新理解与感悟。总之,《燕食记》正是在“情”与“物”的辩证关系中,勾勒了众多人物的精神成长过程。

宫铭彬:以复线历史时间观书写地方文化

小说在讲述七少爷和阿响随“捷声”剧团于乡下暂时休整的同时,还描写了一种生长在珠三角农田地底的小虫。它们名为禾虫,靠草根为生,“一年

两造,雷打不动,随潮汐而来……无关势利和丰歉,按自己的生命节奏繁衍生息……”不论沧桑世事如何变化,人们总还如一年两造的禾虫一般,恪守着一日三餐,在生命本身的节奏中,演绎着人们对时间刻度的理解。所以,尽管《燕食记》涵盖了百年岭南历史的宏阔社会变迁,却依然能有温度地将民国想象的世态人情落在实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葛亮在“宏大”的历史观之外,还启用了另一条时间的复线——藏在一日三餐和节气时令的饮食里的民间时间刻度。也正是在作为复线的民间历史时间观中,我们看到了某种坚韧而有生命力的民间文化特质。

葛亮也赋予了饮食独特的民生空间。随着叙事的推进,小说用般若庵次第举办的素宴,太史第的丝竹炊饮,得月阁外有红点内藏纸条的月饼等情节,使原本只关乎饮食的空间以其自身的方式参与到民国历史的发展之中。但茶楼厨房又是凝固安逸如“世外桃源”的存在。大按小按、慢炒莲蓉的手艺传承,与战火不断、政权更迭的民国保持着距离。于是,通过饮食空间的展开,呈现在读者视野中的民国,不仅是史料掌故为基础还原的历史现场,还是蒸腾着烟火气的生活民生,包含着恒常性的世俗生活追求与日常生活活感。

在人物关系的塑造上,《燕食记》同样选择了更有民间味道的方式。比如五举山伯是个孤儿,先得多男被赵阿爷照顾,后被荣始生收在门下,离开师门后与妻子一起支撑本帮菜馆,并在妻子离世后仍然坚持留在从情感关系上与他毫无瓜葛的家庭里。在这些人物身世与命运描摹中,人与人之间牢固的情感连接来自人物主体对他无条件信任、对多年前承诺的坚持,不依靠父一子、母一子等亲缘关系天然具备的契约性质,而是以师一徒、主一仆、恩人关系等民间情义、道义、侠义的载体,完成对人物精神内核和情感逻辑的塑造。这也是《燕食记》讲述的故事频频让人感动的本质所在,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品质和道德情怀理想状态的展现和书写。

陈婉婷:“饮食文化”和“匠传精神”的交汇

从长篇小说《北鸢》开始,葛亮就已经开始“由饮食而历史”的书写路径。他在创作谈中,阐释了小说中饮食文化具有的高度浓缩象征意义,即饮食文化构成某种微言大义的表达方式,隐喻着中国的文化伦理、历史变迁乃至人情世故。在《燕食记》后记中,葛亮更是直接坦白了创作主旨的延续——思考传统文化“常”与“变”的辩证关系。从“非遗”主题系列来看,匠人精神也是其历史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匠传”的情节结构上同样寄托了微言大义的写法。例如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打好莲蓉,最重要的是一个‘熬’字”,“熬”字不仅是对技艺本身的描

述,词语内在的时间纵深感,内蕴着一系列有关“传统”的想象:如匠人心性的磨炼,技艺的积累,乃至职业生命的漫长,民间行业内的世代相传等,由此形成文化内涵的延伸。葛亮对“匠传”的思考也并非单向度,《燕食记》所叙的庖厨之承,始终没有离开“温食”的经济底色,被文人升耀为文化的饮食又再次被放还民间。

葛亮追求历史的“活气”。在作者层面上,葛亮极度追求历史的细节真实,除了常见的文献考证,田野调查和与历史人物原型深入交流也是其创作准备的重要环节。这不仅为其小说赋予可供把玩的“雅趣”和“掌故感”,还使得大量地方志、民俗学知识和材料穿插于文本。而所谓历史感除了指作家的历史观念,同样体现于作家的文体表达。《燕食记》在情节性叙述之外,还有诗词引首、博客文章、掌故旧事、报刊广告、夜总会消费价目表等等,用不同字体加以区分,形成文体的杂糅。现实创作层面的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更是直接通过叙事人阿毛进入小说叙事层面。阿毛这个叙事者又多次出现在《七声》《瓦猫》《飞发》等中短篇小说中,使这一系列作品间形成某种互文性关联。长篇小说《朱雀》《北鸢》是一种创作主体对历史参与的探索与深入,《燕食记》“亦借由叙事人——研究饮食文化的大学教授信马由缰的田野考察行程,自由穿梭于现实与近代历史的双重空间,实现了对岭南文化的整体回顾与反思。”这种叙事设计在文体杂糅和虚实杂糅之外,更显示了葛亮异于其他作家的历史感:小说里的“我”通向向历史主体们追究追问那些情感的真相和细节,亲身参与到与历史的互动中来。相较于很多作家在历史叙事中常设置的“巧合死亡”情节,以表达历史的某种不及物,显然在葛亮那里,历史是可以抵达的。

王怀昭:将山水画和西洋油画的笔法相交融

读《燕食记》,只觉作者将民国的刀光剑影隐于幕布之后,将平凡人物的生活更多地推至台前,呈现平凡人物在大历史背景之下,面对变故、动荡甚至大变局时的真实反应。葛亮非常注重大历史与小人物生活的连接点,时代变迁和更新过程中“匠心”与“人心”的沉潜与坚持。

就《燕食记》而言,葛亮下笔,用的是类山水画笔法。他以粤式糕点的历史串联百年中国的更迭。其间,有传奇人物,也不乏寻常百姓。有粤港名点,也有平常吃食。这糕点的传承,历经叶凤池的师傅、叶凤池、荣始生、五举,将断未断。有争夺,也有成全;有嫉恨,也有释然。自是一番柳暗花明、人事沧桑;葛亮浓墨重彩地书写,下的是西洋油画笔法的力道。赋予这糕点以滋味、由此糕点牵连出的,既有达官显赫的衰败,也有英雄人物的登台、下场,草蛇灰线、或隐或现,葛亮疏散随意地点染,用

的是中国山水笔法的意境。将糕点做法摆至人前,取名《燕食记》,为的是留下历史浩荡与日常平淡交融的那份坚实。将达官显赫、传奇人物的逸事放在身后,更在末尾两章点出“秋风有信”“尾声无边”,自是有一份人事变迁、时代更迭的厚重与苍茫。葛亮是融合得好的,写出了生活的“常”与“变”,少了苍凉之意,多了水静风停的内敛与练达。

小说除写作笔法交融外,还有一层,是饮食文化及其内在精神的融合。这往往出现在时代动荡之时。莲蓉月饼传至叶凤池,经他隐世于安铺,已有失传的危险。需得借“南天居”的袁师傅打掩护,“得月阁”韩世江点拨,方能成就荣始生。这是历史时间中饮食文化的内在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在陈五举,为与戴凤行成婚,甘愿放弃十年习得的白案功夫,重新归零,学做上海本帮菜,是偶然,也是命定。而粤港糕点与上海菜肴的精髓借由造化机缘,汇于他一身,是共时性饮食文化的碰撞,也是地域间文化精神的交融。两代师徒,一做经,一做饼,经纬交错,搅起饮食界的时代风云,其生命的本真,都在于年少的那份木讷、单纯。

刘可:古典小说传统的新变

作者巧妙地吸收与转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燕食记》中,作者对话本和传奇中“说书人”这一角色的利用,去其形而取其神。既存在着作为记叙叙事与担当线索人物的“我”,“我”又懂得适时隐藏自己的身份与声口,从而形成了对传统结构的超越。其次是多线并进的叙事结构,话本中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技巧,而在《燕食记》中,作者以时空的变换,分头讲述书中主要人物阿举(“五举山伯”)与阿响(“荣师傅”)的故事,在其中又串联其他角色,通过对多个时空的剪裁缝合,展现了各色人物在变迁的历史与地理空间中起伏的一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少年阿举与少年阿响互为镜像,在文本叙事结构上二人的人生经历互为对照;在象征意义上,阿举代表着传承、坚守,也复现师傅阿响的精神历程。

这种带有古典气息的写作形式其实与作者小说创作观念相吻合,他为自己的故事选择了最恰切的讲述方式。作者写出了民间社会中人情的温暖与底层的尊严,主要人物身上的侠义气质,让我们感受到某种传统精神的召唤。比如阿响在时代与个人命运的风雨中成长,但历史的捶打和敲击没有改变他的本性及其作为手艺人对技艺的坚持。总体而言,书中主要角色都是有情有义之人。作者描绘出了民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扶持、彼此信任的感情,这其中透露出作者所肯定、所推崇的理想价值观与社会伦理。这些“变中有常”的故事,在当今一切都快速消逝与变迁的背景下,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抚慰我们的现代性焦虑。



青蓝读书会,于2020年9月正式成立,由中山大学中文系郭冰茹教授倡议发起,带领硕士、博士生每月阅读一本当代有影响力的、新锐的小说,并深入讨论。书籍丰富,辞理迥异。皓如江海,郁若昆邱。欲青出于蓝,唯求新意而发心声。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网合办

晏杰雄、黄赞琴、肖雨桐、薛云、陈亚蓉等5人正在讨论中

《关于告别的一切》:无法告别的困境与追寻

晏杰雄:中大大学原创文学读书会本期围绕路内最新长篇小说《关于告别的一切》进行细读。作者曾言:“这本书试图讨论一切的‘非一切之物’,彻彻底底的不彻底,永恒半途而废或是认真的半真不假。”初遇与重逢之后是告别与不告而别,别离、隐退之后则是记忆的复现与变构,这部典型的“路内式”小说借此布下指涉个体精神困局与时代更变的深层隐喻,也留下众多可供探讨的切入点。主体叙事与所附着的嵌套叙事在情节错位的比照之下,指向自由无碍地重构命运、重建秩序的意图。在日常书写之中,作者、叙述者与人物交互发声,又在隐含哲思的活语迷宫内叠加上多声部的叙事效果,颇具艺术表现力。下面几位同学分别从小说的主人公情感经历、自我与他者之思、叙事艺术、女性群像等角度展开深度解读。

黄赞琴:在告别中寻找心灵的寄托

《关于告别的一切》主要围绕李氏父子的爱情之旅展开,其中,主人公李白的情感经历颇令人感慨。从心动、守护到背叛,从告别到重逢,他在繁复的感情之网中不断追逐寻觅,所寻的绝不仅是爱情,更是身心可依之所、精神寄托之地。

小说中,李白母亲在他年幼时不告而别,徒留他与父亲生活。这一失去女主人而男主人又窝囊平庸的家庭,无法给予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周遭的社会环境又打压着这个残破的家庭。李白自童年时代便缺失母爱,成长历程中内心多受压抑,以致在此后的感情故事中,他对母爱与母性角色的潜在渴求便外化于对待多组情感关系的态度上。例如,其父李忠诚想要追求俞莞之,李白并未产生反感,反而十分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俞莞之等人的出现及善意之举,为年少的他带去了温暖和安全感。又如,曾小然之于李白,是永远不能忘却的初恋。较李白年长的她更似姐姐,李白对她不单喜欢,还有依赖,他的灵魂在她相伴的时光里寻到了寄居之处。这是李白心灵第一次得到安慰,经过时间的沉淀,这段难得温馨的时光成了他一生的梦乡。但与初恋告别后,他再度失却寄托,心灵在反复的告别与寻找之间来回漂泊,始终难寻停靠点。

经历着不断的告别,李白的心灵处于“无所依”的状态,互相交织的渴望、彷徨与逃避长久地伴随着他。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对周边物事产生了更多的理解,心理状态更为矛盾,所追寻之物也更为复杂。李白不断告别又开始新的感情,如此重复,他看似自由、洒脱,实则是心灵无所寄托,他明明能

够找到栖身之地,但仍选择继续孤身追寻,是因为他在一次次告别中,早已处于一种淡然的状态,又或许是幼时父母感情悲剧带给他心理创伤,不愿去相信婚姻。好在李白仍有思想力的,不同于李忠诚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他有自己独特的处世原则。在爱情之外,他也在认真生活,或许他在情感中寻找不到的东西,可以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找到。行进至小说结尾,李白仍未收获一段彻底圆满的爱情。也许,在不久后他会投入新的感情,又承载更多的告别,直至寻到心灵最终的寄托之所。

肖雨桐:在束缚中弥合的自我与他者

路内在书中作了一个精心设定,将主人公命名为李白,与唐代大诗人李白同名同姓。身为作家的主人公看似是话语与真理的主宰者,但实际上更像是边缘人物——不仅与历史脱节还蔑视宏大历史,又将生活处理得一团乱麻。相比大诗人李白,书中的李白倒是落魄潦倒的,只剩冗长乏味的“艳史”可供翻阅。小说中的“规训”无处不在,作为权力的微观具象驯服着书中每一个人,使其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界限。因此李白永远处于一种断裂又分明、被动地消化他者、吸收他者,但小说的存在又分明是李白的传声筒,以荒诞的反差与鲜明的话外音回荡着声声抗争。

路内曾言:“我们是否敢于和这个最细分的‘他者’决裂?我看不一定。”在小说的两次动物园事件中,作者便连接起一条探讨自我与他者的纽带。第一次时,狮子在李白面前杀死了饲养员,人类所“依赖他者钦佩与承认的自尊”成为破裂的残骸。然而,当再一次回到动物园时,李白选择主动跳进熊山。这一跃看似是为了解救小猫,但实际上传达出自我的超越意识。前后事件在对比之间映照出自我与他者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他者在某种意义上就似子官,无论自我走多远,都走不出水乳交融的汲养与唇亡齿寒的羁绊。

但即便如此,书中又以双重束缚的关系指向对“自我”的回归之路。自李白的母亲离开起,李白与青梅竹马的曾小然便以彼此替身的身份,杂糅地叙述着“自我”与“他者”的依存与对峙。“尿不尽”成为两人的幼年心理创伤,伴随着他们以不彻底的姿态游离于性和爱之间,与一段段蓝色易逝的爱情邂逅又告别,终日漂泊流浪。同时,两人又在镜像的凝视中形成对峙。重逢后的曾小然坦言自己“远不像看上去这么整齐”,在祭拜父亲之后方得大梦初醒,留白式地透露出追求自我的倾向。而李白最终也说出

了“我像是掉进了熊山,面对一头正在醒来的熊”。前半生蒙眼即逝,两人就此迎来转折,自我与他者交织划分出镜像外的偏差。于是,“我”在自我中生成,也在他者中修正。

薛云:虚构时代的观望者

幽默的语言是路内创作的引子。将李白在唱台上不带妆不开口之状比作来到大型枪决现场,将李白向期刊投稿之举比作V-2导弹射向伦敦,这种幽默是作者自成一体的语言风格,是对小说主人公内心真实情感的掩藏与修饰。对主人公李白而言,嬉闹和调侃似乎有一种可以抵御时代洪流侵袭的错觉。他就在这般“苦中作乐”里长大,岁月并未把他改造成大腹便便、横肉满脸的疲惫中年人。与曾小然重逢时的他,仿佛还是中学时代那个小镇吴里长大的少年。所以诙谐的语言带来的绝不仅是片刻的欢笑,还有笑声过后才真正显现出的感伤余味。作者状似无意显露的幽默,也舒缓了小说中岁月流逝、时代更迭带来的压抑和苦痛。

《关于告别的一切》展现了作者对现代小说技巧的娴熟运用。在语言风格之外,小说采用了与《慈悲》等作品相同的复线时间结构。一条自李白的童年记忆回溯,另一条则从他曾小然重逢起步,两条线索在交叉之间向前推进,终结于李白在动物园与方薇的通话。“此刻”与“过去”二元叙述时空不断穿插上演,独特的叙述视角与相异的时空交叠成完整的故事。交叉并行的双线叙事使得小说像一首为主人公的人生谱就的乐曲。在双线的交汇点,“此刻”与“过去”由一个词、一句话、或一个故事衔接起来。二元叙述时空之间的即时回应应有难以描摹的宿命感,使得小说不像一首乐曲,也像钢琴交错嵌合的黑白键,紧密相依,而又沾染上时空转换所附带的不同色彩。

小说虽然大部分为第三人称叙述,但更像是李白以第三人称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大段第三人称叙述后,作者偶尔会没有预兆地转换为第一人称,全知和受限视角就在人称转换中交替,正意味着叙述者选择以个人化的视角来抒写自己的内心世界。中间或偶尔插入的第一人称叙述,其实可以看作李白这个真正的叙述者,忘记了隐藏自己的踪迹。路内在《天使坠落在哪里》中这样写道:“我肯定不是局外人。我不是站在外面,不是站在街边,我像是一个不小心闯了红灯、站在路中央观望着这个时代的人,有时候觉得看到的东西很可笑,有时候觉得自己站在那儿也很可笑。”路内通过小说创作让读者

看到自己眼中的时代,李白则通过视角切换将身为旁观者的读者拉入故事当中。这是路内文字的魅力,也是小说创作的魅力。

陈亚蓉:鲜活的生命过客

路内在《关于告别的一切》里运笔形塑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赋予了她们鲜活生命和独特品格。小说里,“鲜活”如“白月光”的曾小然,她有着如普通邻家姐姐般的懂事和沉稳,但更惹人注目的,是她如刺猬般执拗的独特锋芒——父母合葬的决定不允改变,青涩爱情带来的直白羞辱于她而言只需“付之一笑”;周安娜,交往52位男性是她对世俗规矩的反叛,她如长有反骨的独行侠,放荡不羁且个性张扬。正如书中所说“她像一个赌徒随意抛弃了手中的扑克牌,造成一种漫天飞舞的视效”,她永远骄傲且自由;还有钟岚,普通的钟岚不起眼吗?她好似一个矛盾体,倔强外表下包裹着天真而柔软、渴望被爱的心,烟火气息里潜藏着对文艺的内在追求……作者笔下的众多女性似是百花园中坚韧且鲜活的花朵,盛放或凋零时永远保持着自身的态度观念,即女性本应各具独特气质,或天真,或倔强,或勇敢,或洒脱,或骄傲,而不应为世俗的眼光、身份的约束、糟糕的情感经历、鸡毛蒜皮的琐事所定义。每位女性皆是鲜活灵动的生命个体,不论扮演何种社会角色,都是独立而独特的。

将这些女性人物视为独立个体时,她们与主人公李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便得到了解释。不论各人以何种情感和身份产生交集,爱情、友情、亲情或是一夜情,青梅竹马、朋友、偶遇者或是爱人,这些女性人物最终只是李白父子生命中的过客。情感关系的结局是否完美因此也显得无足轻重,反而会得到读者的宽容和理解。在容纳了过去与现在、相恋与背叛、相伴与分别、生存与死亡的种种时空里,面对诸多过客关系的李白,自始至终坚持着他的情感立场,即“爱情就是:我应该陪着你把一手烂牌打到底,并且永远不去讨论它意味着什么”。

然而,即使女性角色往往以过客身份掠过,她们依然在整部小说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再粗壮的树干,失去绿叶的装点总显得单调乏味,作为架构小说主体的一部分,这些鲜活的独立个体的存在意义便寄于其间。对于李白父子而言,不论联结彼此的是何种情感关系,不论最终上演的是悲剧还是喜剧,这些各具风采的女性角色都是他们记忆里色彩明丽的故人。



中大大学原创文学读书会成立于2019年12月20日,隶属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由中国作协会员、博士生导师晏杰雄教授担任指导老师,成员有中文系本科生、硕士、博士、青年教师等百余人。读书会与学院所开设“新世纪小说研究”课程结合,对国内最新原创文学作品进行跟踪研读,旨在提升师生文学原创能力和鉴赏能力,从文学发生机制提升基本文学素养,形成中文专业自觉和对文学现场发声能力。

